



美国中国学史研究

——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

朱政惠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美国中国学史研究

—★— 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

朱政惠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中国学史研究: 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 / 朱政惠
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8
ISBN 7—5325—3842—7

I. 美... II. 朱... III. 汉学—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631 号

美国中国学史研究

——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

朱政惠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56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2 字数 285,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842—7

K · 622 定价: 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T: 64063949

探索无止境

——朱政惠教授《美国中国学史研究》序

探索犹如登山,我以为只有那些不畏艰难险阻,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能登上峰顶,才能领略这创造性成果的来之不易。在历史研究领域,探索艰辛,创新更难。但志在攀登历史科学高峰的当代中国史家,不能以其难而畏步不前,而放弃了自己的追求,而忘却了自己的使命^①。

这是八年前,读朱政惠教授大作《史之心旅》后我在一篇文章中写下的一段话。的确是这样,政惠兄就是这样一个在历史科学领域中,沿着陡峭悬崖,不畏艰险的“登山运动员”,从他早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到这部新著的问世,艰难跋涉,志在攀登,一步一个脚印。

探索之路艰辛。政惠的新作,为这种探索留下了新的足印。且看这里所辑集的文章,或理论阐发,或个案分析,或研究综论,或史家掠影,或学术考察,一言以蔽之,其字里行间,不时迸发出来的就是两个字:探索,一种艰辛的探索,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

中国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潮流促进了学术上的探索与争鸣,改革开放的春风又极大地催发了学术研究的深入与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发。政惠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正是从一个侧面映衬着社会深刻的变革,显现出学术革新的时代印记。

八年前,记得是在1996年的初春时节,我应邀参加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会议,作为中心主任,政惠在会上的讲话,自谦中透着自信,困难中充满信心,至今仍使我印象

深刻。不管怎样,他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史之心旅”,一次新的探索。

披览全书,发觉政惠对海外中国学的探索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书中首辑“从接受研究和比较研究说起”诸文,可见其踪迹。作者从“接受史学”、“比较史学”的研究出发,提出了“从接受角度研究史学”,并对“比较史学”与“比较历史”概念正名,在当时颇具创新意义,引起了学界热烈的回应。不仅如此,他由此而产生联想,其思想触角很快地延伸到了他所要探索的下一个目标:海外中国学。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持之以恒,集多年之辛劳,终成大器。

诚然,海外中国学研究,并不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学问,或许可以说,它即是我们习称的传统的“汉学研究”。

追溯历史,西方学者掀起第一次“中国热”,兴起“汉学研究”的热潮,是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年代里。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等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十分仰慕,如他据《赵氏孤儿》法译本而改写成诗剧《中国孤儿》,全剧处处洋溢着中国哲学智慧的灵光,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在 18 世纪西方哲人那里,他们所“发现”的东方——中国,是一个由一群理性的哲人治理的“模范国家”和“模范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理性的完美体现。当然,这种经过他们改铸过的东西未必精当,那是为他们那个时代反封建反神学的主题而提出的“救世良方”,但启蒙思想家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关注,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到了 19 世纪,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的“再发现”中,似乎来了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中国文明与中国文化采取了一种贬损的态度。如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中,中华文明所反映出来的东方精神实际上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西欧中心论”的偏见窒碍着他们的视野,桎梏着他们的思想,以致使他们(不管是“书斋型汉学家”、“传教士型汉学家”,还

是“外交官型汉学家”)不能正确看待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社会和学术文化。

至20世纪,特别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西方的汉学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日益精细与高度综合,因而,成果亦丰。对此,论者多有阐发,兹不再述。

我们这里所称的“海外中国学”,更多地体现了“二战”后的现当代社会的时代特征。于是,学界有人就把“二战”前的这种研究称之为传统的“汉学研究”,“二战”后则称之为现代的“中国学研究”。不过,时下学界对何为“汉学”、何为“中国学”,是将两者等同,还是把它们视为两个发展阶段,或者别的什么,争论不休,迄无定见。界定这两者的内涵与外延,探求这两者的来龙去脉,无疑将有助于我们研究工作的深入。但学术研究毕竟不能从概念出发,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政惠兄的意见,为了更有助于我们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可以把传统的汉学研究和现代中国学研究统称为“中国学”(本书第45页),这是颇为明智与可行的。不管怎么说,政惠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近10年所作的海外中国学的探索,颇具新意,因为它体现出时代的特点;颇具意义,因为它蕴涵着深刻的学术价值。

为了回应政惠的海外中国学研究,就前述的后一方面,即它的学术价值,我在这里略陈陋见,说些外行话,以求教于学界同仁,更求教于政惠兄。

其一,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进一步发展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需要。

中国新时期以来,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国际地位的明显变化,海外中国学逐渐升温,并趋于热门。据本书所透露的数字,说当今海外从事独立研究的中国学家其总数不少于1万人,且这支队伍目前还在不断增长,真可谓是气势恢宏

(本书第44页)。相对于蓬勃开展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的“反研究”(即“研究的研究”)还是举步维艰,不免逊色,这就非常不利于我们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有道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由于从相异于中国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出发,他们的视角、方法及理念,往往与我们相悖,读他们的作品,常有一种惊喜或意外的发现。例如,以研究清史而言,阅读美国学者何伟亚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或阅读美国学者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其书所揭橥的写作旨趣、史学理念、研究方法与文本叙述等,平心而论都是可供我们借鉴的,更不必如论者所说的那种阅读时的“兴味盎然”、“思如泉涌”与“峰回路转的惊喜”了^②。又如,在本书中,作为个案着重介绍的“他乡夫子”史华兹,无论是他的扛鼎之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还是他对中共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在美国学界所做出的开拓性的研究,都是可供我们参考的。正如政惠所指出的,“对他(史华兹)的研究,不仅是对他个人研究的需要,也是我们对整个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需要,了解其研究的方法和进程。这对我们自己的中国问题研究是必要的,也有利于我们对世界文明的总体研究”(本书第234页)。

诚然,“他乡夫子们”——不管是史华兹也好,还是他的学生孔飞力也罢,他们的研究也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但可贵的是,他们所提出的种种范式理论或研究方法,似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系,其学术价值是不可泯灭的。“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这是苏格兰诗人彭斯早就期盼的。说得多么好啊,“能以别人的眼光来审查自我”,亦即从对方的视角去观察与思考问题,这对我们学术研究工作来说,意义非凡。从己方立场出发,加之从对方视角思考,也就是说,从两个方面观察,总比仅从一方(己方)出发要全面些,要深刻些,或可少些那种“身在此山中”的感叹,由此我联想到,这种多中心、多元的后现代主义的风调,不也

是一种值得我们期盼的文化景象吗?

其二,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进一步发展中外(西)学术文化交流的需要。

谈及这一点,我又想起了文学家柯灵所说起过的一个掌故:1936年日本文学家岛崎藤村从南美归国,途经上海,适值鲁迅先生逝世不久,这位日本作家特地到鲁迅故居凭吊,在鲁迅生前常用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岛崎归国后乃撰文追忆,说起他坐在椅子上的那一瞬间,仿佛感觉到鲁迅的体温传到了自己的身上。这则文坛轶事也许鲜为人知,不被人所注意,但值得我们细细品味。这里虽然说的是中外文学交流所能引起的沟通作用,那么史学交流呢?抑或其他学术文化之间的交流呢?我想也是能的。政惠所做的是史学方面的交流工作,倘若缺少了这种学术上的交流,那么,现代人类也会感到苍白与浅薄的^③。

在新世纪,中国史学要进一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这是毋庸置疑的发展方向。为此,当然要让国际史学界了解中国,也要让中国史学界了解域外。在当今世界已发展为“地球村”的时代,以海外中国学为例,如果我们对他们的研究,亦即他们对我们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漠然无知,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那么在这方面的交流不就成了“聋子的对话”?为此,我们要花大力气对海外中国学进行“反研究”,这是为了发展中国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为了发展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需要。

总之,为了发展21世纪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发挥其主导地位与主流影响,我们应当摒弃那种或盲从或封闭的文化心态,积极而又认真地引进海外中国学,译介其中优秀的作品,并以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做出学术上的回应,惟其如此,才能日益融汇于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中。这正如智者所言,“从而使我们既不丧失自我认同的坚实前提,又能跟现实世界构成良性的互馈”^④。

其三,深入开展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史学史研究的需要。

我与政惠都是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研究工作的,虽侧重点有所不同,政惠比较多的关注中国史学史,而我则侧重于西方史学史,但海外中国学研究却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那就是姑且被我称之为的“影响研究”,这也是我近年所关心的课题。

我这里所说的“影响研究”,指的是史学史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各自史学自身发展历程的研究,还应当研究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史学文化的相互交汇与相互影响。我个人以为,海外中国学是一种“研究的研究”,也是一种史学上的“影响研究”,即是说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在域外学者中引起了多大的回响(这集中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而这种学术著作又是如何引入中国,并对中国学界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既是相互交汇,更是相互影响。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的史学史研究,因当今中国学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可望成为我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也是政惠所说的比较史学的题中之义。在这方面,政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尤其要说的一点是,他在学校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下所设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吸纳了不少有志于此的莘莘学子,每年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都有这方面的佳作问世。他的高足陈君静于近期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⑤,这足以令他欣慰与自豪。

探索之路漫长,海外中国学的探索也将是漫长的。在这一行程中,政惠不是“独行侠”,但他却是一位在众多登山者中的佼佼者,一位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探索者。探索,发现真理,再探索,再发现,以至无穷。探索之路无穷,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探索之路亦无穷。我们期待政惠在这种永无止境的探索中取得新的成绩。

政惠兄与我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同饮一江水。多年来,在学术

上相互切磋,乐此不疲,此乃挚友也。欣闻他的新著《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即将出版,这使我十分高兴。近日,他寄来了书稿,嘱我为其大作作序,这令我诚惶诚恐。再三推辞未果,只好遵命就论题旨趣及相关问题赘说一二,是为序。

张广智

2004年夏日于复旦大学

① 见拙文《探索者的足印》,载《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7期。

② 参见赵世瑜、杜正贞、张宏艳《政治史、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叫魂〉三人谈》,载《民俗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参见拙文《关于20世纪中西史学交流史的若干问题》,载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刘东:《阅读中国序》,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喜马拉雅学术文库·阅读中国系列》。

⑤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前 言

这本集子汇集了笔者多年撰写的文章——一个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理论思考与实践的历程。

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研究？道理很简单。现在海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出现很多研究专家，出版很多新的著作，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甚至全家两代、三代地探讨下去，形成专门的学问。一个跨学科的中国问题研究的新领域在世界很多国家发展，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在相当程度上代表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影响国际社会及其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做反研究，不做学术的反馈。中国正在和平崛起，这种研究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

其实，我最开始的探讨，还是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这个研究方向突破的。原始的动机有两个：其一，我们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除了纵向的探讨即对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史学的研究外，还有一个横向的问题，即对西方和东亚邻国史学与中国史学交流及其相互影响的探讨，这样，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才更全面；其二，随着海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研究的发展，中国学者对海外研究的反馈也在发展，加强这方面学术史的清理和反思，也成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题中应有之意。

基于上述学术实践的需要，笔者主要从这些方面做了努力。一是如何从理论的高度，认识研究海外中国学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意义。当时，从两个方面深入对此问题的思考：一个就是从接受史

学的角度来看史学传播、中介和史学接受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史学交流的必要性、必然性问题。我自己非常注意从文学领域、哲学领域吸取理论智慧来丰富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些接受美学和比较文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启示,很难形成自己对史学史研究的这些新思考和新视点,也很难下决心酝酿新的思路去把握这些问题。可以这样说,跨学科理论方法的启迪,丰富了自己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新认识,而这些新认识,有利于对史学史研究的新思考,以致形成对海外中国学史研究的新考虑。我是把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分支方向来把握的。

在我的认识中,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和海外中国学史这三块研究是相互依存的三个重要方面,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相关重要环节。我们要研究好中国史学史,没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唯物史观是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同样,不断吸取我们民族和海外的优秀理论方法,也是我们深化史学史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为我们深入中国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学术背景。海外中国学家总的说是作跨学科的研究,但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而言,最重要的是珍惜他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他们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他们的理论、方法及其成果怎样;还有就是他们如何研究中国史学史,如何看待中国的史学、看待中外史学的交流和结合。有了这两条,我们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就有个比较,有个合适的参照系。由此也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我们自己的成果、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史学发展大背景中、在中国史学发展长河中的地位和份量。从这点上看,对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是深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至少少了这个环节,大平面研究会受影响。而这个大平面,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和建设的主体。

如果说,从理论上认识这三者的研究与互动是必要的话;那

么,把这种想法推向实践的努力会更为关键。我本人一直朝这样的目标努力,也得到了学校方面的有力支持。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于1996年3月26日成立,这在当时国内,属于相当早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这个机构主要进行对外交流的工作,还有就是培养研究生。中心在研究生的培养上颇花了点工夫。利用我们这个博士点的学科背景、历史系的资源和师资条件,经过几年努力,培养了多名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一些研究生写出了相当优秀的学位论文,有的还撰写了不错的学术专著,得到国内同行的颇高评论。

实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走出国门,直接到海外了解人家研究中国的情况。只有真正到海外考察和研究,才能比较深入扎实地认识人家,才有条件回来更好地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

实践还使我有这样的新认识,那就是,只有深入了解某一具体国家,才能求得对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比较深入的见解。事实上,美国成了我研究海外中国学的主要突破口。我也希望通过对它的了解,求得对世界中国学发展脉络的大致认识。美国中国学也确实是当今世界中国学的代表性国家。很幸运,在获得一项国家留学基金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燕京学社的邀请和热情帮助下,我在那里进行了整整两年半的学术访问。为了了解这个国家的中国学的具体情况,我还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走访它们的中国学研究机构,拜晤那里的中国学家,了解其工作状况、资料收藏以及研究生教学和培养情况等。可以说,美国大学中最著名的近20个中国学机构及其东亚图书馆,我都走了一圈。

两年多的观察和思考,以及资料的采集,使我得以积累几方面的重要材料:一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基本的基础资料;二是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国家中国学研究史的总结资料;三是美国中国学家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资料。这几方面的资料对我研究美国中国学史大有裨益。相当部分资料是国内无法收集到的。尤其是第

二、三部分资料。目前国内对第二部分资料的重视还不够,引进和介绍也薄弱。实际上学术史的清理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中国学家对自己国内的中国学研究历程还是不断有清理和反思文章的,他们本身的反思和认识,对我们认识美国中国学发展史是至关重要的。第三部分资料,与我们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关系最密切,我也是下了大决心搜集的。有了这些资料,对美国如何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底细便相当清楚了。顺便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史料工作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第一位的工作。否则一切免谈,研究海外中国学也不例外。

这些资料的收集和实地的考察、访问,也使我形成对美国中国学或者说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看法。这就是:(1)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和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历史研究相结合;(2)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状况研究相结合;(3)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和中国与这些相关国家的关系史研究相结合;(4)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和国际学术思潮研究相结合;(5)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和这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及其母语语境研究相结合;(6)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与研究对象具体的机构背景、人物特点的研究相结合。我觉得这几个结合是缺一不可的。而采用这些方法的目的,就是希望究明中国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在彼国彼地的接受和认知情况及其原因,以及由此引起的关于中国观等许多问题认识的一系列演变。最终目的,是为了我们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国家的强盛与和平崛起。如果从整个国际文化发展的格局来看问题,这种跨文化或跨文明的研究,还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往并达到共同繁荣。

在美国的考察中,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就是看到了当代美国著名中国学家史华兹的学术档案。我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阅读这份档案,收获可谓不小。这实际上使我形成又一个重要

想法,那就是:为深入认识美国中国学,需要解剖一个具体学术人物或者思想家。史华兹的学术档案非常丰富,有他的全套教学计划、教学提纲、著作和书评的打印稿,以及有关书信。史华兹的丰富的学术档案史料使我认识到,如果能将史华兹的学术生平及其主要理论方法的来龙去脉弄清,可以说八九不离十地把握了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大致线索。

我想,这本文集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所考虑的这些问题。有理论的思考,也有实践的感受。不过,本文集所涉及的问题和史料,只是海外携回的材料的最小一部分,探索还刚刚开始,前面的路还很远。

我经常会这样想问题:这是在圆一个梦吗?因为这样一个跨国的学术问题研究,在没有合适的学术条件和历史背景下,几乎不可能。我庆幸自己碰上了很好的历史机遇。

诚然,这里面会有不少超越史学史研究的内容。然而,海外中国学历来就是多学科的综合和交叉,在 21 世纪的今天,跨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研究会更加发展。我们应有适应这种学术发展大趋势的思想准备。不管怎么样,它都在学术史研究的范畴内,是史学史、学术史研究的新增长点,是在学术发展的客观需求中形成的。辟开榛莽,困难很多,方方面面。所幸的是,我得到海内外很多学者朋友的支持。吴泽先生也十分支持我的想法,希望我坚持不懈。他们使我了解和认识了很多,我衷心地感谢他们。

朱政惠

2004 年 6 月 18 日于沪上

目 录

探索无止境·····	张广智	1
——朱政惠教授《美国中国学史研究》序		
前言·····		1

一 从接受研究和比较研究说起

从接受角度研究史学·····	3
关于比较史学研究的若干问题(附二则)·····	14
日益受到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	28
不可忽视的另一边	
——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43

二 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综论

美国中国学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51
关于美国中国学家的总结和反思	62
20 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76
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情况述略	
——以历史学研究为主线的考察	100
关注国际上海学的前沿研究	
——对 138 篇海外博士论文的介绍和评析	124

三 美国、法国的中国学家

一位杰出中国学家的生动写照

- 英文版《回忆费正清》读后 143

施拉姆教授的毛泽东研究

- 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一个访问 152

求真·求实·求新

- 巴斯蒂教授的中国学研究成就及其特点 163

驰骋国际汉学界的骁将

- 在耶鲁大学拜见史景迁教授 181

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 192

四 史华兹研究专论

史华兹中国学研究析略 219

史华兹和他的严复研究 238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一个重要学案

- 评史华兹对东亚政治秩序问题讨论的组织和研究 253

他乡有夫子

- 史华兹生平和学术谱略 267

五 学术考察记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大本营

-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印象记(附三则) ... 301

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及其科研走向 330

后记 345